

俄罗斯——苏联文学简史

北京师联教育科学研究所 编

学苑音像出版社

丛 书 名:文学史及评介

书 名:俄罗斯——苏联文学简史

作 者:北京师联教育科学研究所

出 版 社:学苑音像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5-1-1

ISBN:7-88050-468-0/I209

定 价:10.00元

俄罗斯——苏联文学简史（上）

第一章 古代文学

第一节 概 说

俄罗斯古代文学，大体上就是中世纪的罗斯文学。这是俄罗斯文学一个相对漫长的准备时期。由于种族演变等关系，这一时期的文学往往不是纯粹的俄罗斯文学，而实际上是包括后来演变为乌克兰文学、白俄罗斯文学等的文化基因在内的东斯拉夫文学。

大约在六世纪，东欧平原上开始出现了东斯拉夫人的氏族部落。九世纪时，氏族部落逐渐演变为公国，这些小公国多以一城市为中心，形成了封建割据的局面。至822年，诺夫哥罗德王公奥列格灭了诸多小国，攻占基辅，建立了一个东至伏尔加河、西止喀尔巴阡山的大公国，即基辅罗斯。基辅罗斯是一个庞大的封建国家，经济以农业为主，在宗教上是泛神的、多元的。统一的大公国的建立，促进了文化的发展；但落后的农业生产方式、封闭的封建统治制度，又使得这一地区的文化和文学落后于东方和西欧的文明。不过，由于基辅罗斯地处北欧至拜占庭、东方至西欧这两大文化和经济交流线的十字交叉处，故经济和文化都得到了较为迅速的发展。东西南北文化的交融，终于形成了在世界文化之林中独树一帜的东斯拉夫文化。在外来文化中，尤以拜占庭文化对俄罗斯的影响为最大，从绘画到建筑，从文字到宗教，拜占庭风格对基辅罗斯都有深刻的渗透。公元988年，罗斯受洗，正式将基督教定为国家。这是一个对俄罗斯社会发展具有深远意义的事件，它不仅使俄罗斯在宗教上接近了基督教世界，贴近了西方文化，而且也在意识形态上对当时的社会起到了一种统一的作用，同时将宗教的影响扩展到文化的各个层面。

从十一世纪起，由于土地占有的扩大化，大、中型古代占有者开始渴望摆脱大公的统治，封建割据的局面开始出现。南方的突厥游牧民族的不断侵扰，也加速了基辅罗斯的解体。直至十三世纪，蒙古鞑靼人征服了东欧，在东斯拉夫的土地上建立了金帐汗国的统治。从此，俄罗斯人民开始了漫长的反抗异族压迫的斗争。他们不仅与统治者的蒙古鞑靼人斗争，同时还要抵御来自西、北欧的日耳曼骑士军和瑞典十字军的入侵。1240年，诺夫哥罗德大公亚历山大·雅罗斯拉维奇率俄军在涅瓦河口大败瑞典人；1242年，他又率军在楚德湖上与日耳曼人大战，在这次著名的“冰湖之战”中打垮了日耳曼军。与此同时，东部的各小公国在与蒙古人的斗争中逐渐形成了一个以莫斯科为中心的联合体，终于，在1380年，由莫斯科大公季米特里·伊万诺维奇率军在库里科沃取得了马迈蒙古军的大胜，动摇了金帐汗国的统治。又过了一百年，莫斯科大公伊凡三世最终将蒙古鞑靼人赶出了俄罗斯。1547年，伊凡四世正式采用“沙皇”的封号，一个以莫斯科为中心的国家，虽统一了俄罗斯，但其内部仍充满激烈的斗争，最典型的体现是1667年爆发了由斯捷潘·拉辛领导的农民起义。在政治、经济和文化多方面，俄罗斯仍显得很落后，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十七世纪末的彼得改革。

综观长达数世纪的俄罗斯古代文学，可以发现以下一些特点：

在整体风格上，俄罗斯古代文学表现出一种重传统精神的保守风格，这是相对落后的生产方式和长期的封建割据的结果。

同时，在文学的内容上，一个总的主题就是反对异族压迫、呼吁罗斯统

一的主题，这一主题不仅贯穿俄罗斯古代文学的发展历史，同时也为后来的俄罗斯文学所继承。

从构成上看，俄罗斯的古代文学是一个综合体，其中包括民间创作、宗教文学和王公侍卫阶层的文学等。这些成份既互相渗透，也有所排斥。其中，宗教文化和世俗文化的冲突，就是中世纪文化发展中的突出特征之一。

俄罗斯的古代文学，尚未能完全地从宗教、历史、民间仪典等范畴中独立出来，因此，这一时期的文学多是上述多范畴之一部分，俄罗斯古代的文学作品，也往往同时是历史的、政治的、伦理的杰作。

第二节 基辅罗斯时期及其之前的文学

俄罗斯的书面文学大致出现在基辅罗斯时期的最初。那时，拜占庭的修士基里尔和梅福季将希腊字母加以改造，创建了古斯拉夫字母。但在此之前，俄罗斯古代的民间口头创作的文学早已存在。

基辅罗斯的文学，大致包括这么几个成份：仪典诗歌、史事诗（又译“壮士歌”、“英雄歌谣”等）、传说故事和王公侍从文学等。

早期的仪典诗歌，多是与多神教的图腾崇拜仪式相关的，斯拉夫先民膜拜森林、泉水、春天、雷电等等，为具有魔力的大自然现象献上简单的颂词，表达他们内心的敬畏和希冀；逐渐地，与日常生活相关的仪典诗歌也开始出现，在婚表嫁娶、宴席节庆等场合，都有歌的出场。这些仪典诗歌，大多是即兴式的口头创作，篇幅短小，用词自然，但由于文字的不发达，它们大多没有留存下来，今人所能知道的，只是后来被记进编年史中的、或已融入传统的谚语谜语格言警句等之中的碎句断片式的仪典诗歌。不过，仪典诗歌来自古代罗斯生活的深处，因而仍具有传统意义，影响到后世文学的，不仅有其内容，而且还包括其形式，为哭诉诗、谣曲等。

在古代，俄罗斯民间的故事和传说也流传很广。这些传说又被称为“口头编年史”，因为在这些传说中包含着许多真实的历史故事，有些故事经过加工，后被写进了编年史，也被写进了后世的文学作品。比如，关于基依、谢克和霍里夫三兄弟创建基辅城的故事，关于穆斯季斯拉夫和罗杰里两位武士决斗的故事，等等，代代相传，为今在俄罗斯仍是家喻户晓的。

在基辅罗斯建立之前，有许多俄罗斯的小公国并存。在这些公国的小朝廷中，经常活跃着一些“职业”歌手，他们为王公们演唱，给王公们讲叙故事，这些人的作为构成了所谓的王公侍卫文学。有人推论，后来出现的《伊戈尔远征记》中的歌手鲍扬、甚至连这位不知名的伟大的史诗作者本人，就是当年的“宫廷诗人”。这些人以创作为业，自然对诗歌技艺的提高颇为留意，因而对文学创作的规范化技巧化有一定的促进作用。王公侍卫文学的内容，大多为对王公及其力量的颂扬，也有对日常生活的描述和对俄罗斯的自然和未来的歌颂。

史事诗是古代俄罗斯民间创作的最高峰。它产生在封建社会的早期，但它的存在和流传则持续了数个世纪，从基辅罗斯的建立一直到蒙古鞑靼人统治的前期。这类诗多以某位勇士为描写对象，采用夸张、比拟等艺术手法，表现勇士们保卫故土、战胜敌人的事迹。史事诗中最著名的勇士有多勃雷厄亚·尼基季奇和伊尔亚·穆罗梅茨。关于前者的歌，有《多勃雷厄亚与蛇》、《多勃雷厄亚作媒》、《多勃雷厄亚和弗拉基米尔吵架》等等。伊尔亚·穆

罗梅茨，据说原是一个瘫痪人，在喝了术士的蜜酒后成为力大无比的勇士，他四处征战，“为了正教的信仰，/为了罗斯的土地，/为了光荣的都城基辅，/为了孤儿寡妇和家人。”为了人民的利益，他与多种多样的敌人决斗，甚至不惜与王贵侍卫们为敌。史事诗中的勇士形象，是人民爱国精神的体现，是人民心目中理想的英雄人物的化身，因此，这些人物感动着一代又一代的俄罗斯人，人们在文学中再现他们，在影视和舞台上塑造他们，还用这些勇士们的名字命名公共设施、以至新型的飞机大炮，由此亦可见史事诗之影响的巨大和深远。

在基辅罗斯时期，最重要的文献就是编年史。编年史是按年代编排史实的著作，因编年史往往收集有大量的古代传说、现成的传记和书籍史料，故具有极高的史学和文学价值。编年史同时也具有强烈的政治色彩，其作者不仅仅是冷静旁观的治史者，他们常出面对史实和事件进行评判，并提出其政治理想，号召读者参与行动。所以，俄罗斯古代的编年史，并不仅仅是珍贵的历史和文学文献，它更是一部当时社会精神文化生活和政治经济生活的百科全书，是留赠后世的一座座文化宝库。保存至今的，大多是后世的抄本。

在所有的编年史中，最有价值的是由基辅洞窟修道院的修士涅斯托尔在十二世纪一十年代写成的《编年故事》。

《编年故事》的内容十分丰富，其中有关于天气变化的记载，也有关于政治事件的笔录，有外交和法律方面的文件，也有民间的传说和故事，有外来文献的译文，也有独立成篇的文字作品（如圣徒传记、历史故事、神学训诫等等）。这是一个中世纪文献综合性的集成。《编年故事》决不是有关材料机械的堆积，主题和思想内容的一致，使这部作品得以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作者在编年史的开头写道：“此往年故事，系叙述俄罗斯土地自何处而起，基辅最初的王公是何许人，俄罗斯国家如何建立。”由此可见，《编年故事》的作者是将基辅罗斯的历史和整个俄罗斯民族的历史联系起来考察的。《编年故事》带有明显的时代特色。首先，它体现的是封建主阶级的思想意识，作者将关注的目光集中在王公阶级的作为上，在评价历史事件时，也是以王公阶级的利益为出发点的，对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和社会的经济活动则反映较少。其次，作者对历史的记述，带有浓重的宗教色彩，神的力量，被描绘成一切历史事件和人的行为的原动力。然而，富有文献价值的史料，细致优美的文字和渴望俄罗斯民族统一昌盛的进步思想，却使这部作品超越了时代，成为一尊不朽的纪念碑。

成书于1113年的《编年故事》，不是第一部编年史，也不是最后一部。在基辅罗斯的之前和之后，存在过许多大小公国，而每一个公国几乎都有过自己的编年史。有学者认为，最早的编年史出现在十世纪左右，如基辅的洞窟修道院的编年史。后来的一些考古发掘，发现了一些刻有文字的桦皮，一些古老教堂墙壁上遗留的“刻痕”，都证明了古代“纪事”的存在。基辅罗斯之后，割据一方的公国均写作了自己的编年史，其中较为重要的，有《诺夫哥罗德编年史》，《费拉基米尔—沃雷斯基编年史》等等。编年史的编写传统，一直持续到十五世纪的莫斯科公国时代。

第三节 《伊戈尔远征记》

史诗《伊戈尔远征记》是基辅时期文学、同时也是整个俄罗斯古代文学

中最伟大的作品。这部史诗以真实的历史事件为素材，刻画出了伊戈尔等俄罗斯勇士的形象，表达出了反对王公内讧，维护罗斯统一的爱国主义思想。马克思在读了这部史诗后曾说：“这部史的要点是号召俄罗斯王公们在一大帮真正的蒙古军的进犯面前团结起来。”

史诗的作者不详，后人猜测为接近王公的某位武士或宫廷歌手。《远征记》写到了被俘的伊戈尔于1185年的逃回，却没有提及随父出征的伊戈尔之子弗拉基米尔于1187年逃回，学者们据此成功地将《远征记》的成书年代断定在1185—1187年之间。在《远征记》诞生的年代，基辅罗斯已面临解体的危险，各方诸侯纷纷自立朝廷，封建割据加重，王公们彼此之间连年作战，罗斯陷入纷争的灾难之中。与此同时，生活在南方草原上的突厥游牧民族，乘机对罗斯进行侵扰，于是，俄罗斯人与突厥人的战斗便在伏尔加河和第聂伯河之间的广阔草原上不断地进行着。1184年，基辅大公斯维雅托斯拉夫曾对南方的突厥族之一支的波洛韦茨人进行了一次成功的征讨。次年，未能参加这次征讨的诺夫哥罗德王公伊戈尔率军对波洛韦茨人进行又一次征讨。这次征讨以失败告终，伊戈尔本人也被俘。史诗描写的就是伊戈尔这次失败的远征。这部不足千行的史诗，可分为五个部分，除序诗和尾声外，还有主体的三个部分。第一部分写伊戈尔不顾日蚀的凶兆执意出征，初战告捷，再战则大败，伊戈尔被俘；第二部分写基辅大公斯维雅托斯拉夫的“金言”，他批评了伊戈尔的一意孤行，号召王公们团结起来，共同抵御异族的侵略；第三部分写俄罗斯大地受人民之呼声的感动，帮助伊戈尔逃回了罗斯。

伊戈尔是《远征记》的主人公。对于这个主人公，《远征记》的作者所持的态度是双重的。一方面，作者欣赏伊戈尔为了国家挺身而出的行为，歌颂了他在战斗中勇敢无畏的精神；另一方面，作者也批评了他为了追求个人荣誉而擅自出征的自私举动，指出了伊戈尔的行为给罗斯带来的灾难。史诗写的是伊戈尔的远征，但史诗中最主要的两个部分却是“金言”和“哭诉”。在描写了伊戈尔失败的远征之后，作者让基辅大公斯维雅托斯拉夫对众王公“吐露了含泪的金言”，他在——列举了俄罗斯王公和军队的荣光之后，也严厉地批评了伊戈尔的行为和王公们的内讧：

雅罗斯拉夫和符谢斯拉夫的所有子孙！
请把你们的军旗低垂，
请把你们残钝的宝剑插进鞘中。
因为你们已丧失了祖先的光荣。
因为你们已以自己的动乱
开始把邪恶的敌人
引向俄罗斯的国土，引向符谢斯拉夫的财宝。
要知道，正是由于你们的内讧，
暴力才从波洛韦茨人的土地上袭来！

伊戈尔被俘后，山川草木为之动容，伊戈尔的妻子更是悲痛万分，她“像一只无名的杜鹃”，一大清早就在普季夫尔的城楼上“哭诉”，她质问风，质问河，最后质问太阳：

光明的，三倍光明的太阳啊！

你对任何人都温暖而美丽，
神啊，你为什么要把你那炎热的光芒
射到我丈夫的战士们的身上？
为什么在那干旱的草原上，
你用干枯扭弯他们的弓，
用忧愁塞住他们的箭囊？

伊戈尔之妻雅罗斯拉夫娜的哭诉十分感人。从她的这段“哭诉”，不难看出《远征记》与民间创作传统的密切关系。除此之外，史诗中的一些固定修饰语（如“钢铁的矛”、“快捷的马”、“黑色的犬”、“灰色的狼”等等）、取自大自然的象征等等，也都是取自民间歌谣的。

在《伊戈尔远征记》成书的年代里，在欧洲还出现了另外几部史诗，它们就是法国的《罗兰之歌》、西班牙的《熙德之歌》和德国的《尼伯龙根之歌》。这几部史诗曾被并称为欧洲中世纪的“四大英雄史诗”。将《伊戈尔远征记》与另外三部史诗比较一下，可以发现一些相近的地方。首先，它们写作的年代很相近，都在十一至十二世纪，写成后均被埋没了数个世纪，又都在十八、十九世纪之交时由于浪漫主义文学运动的兴起而被重新发现；其次，几部史诗均表达了忠君爱国的主题思想，并塑造了勇敢的骑士和战士形象；最后，几部史诗都具有浓重的悲剧色彩，主人公不是被俘，就是战死，但最后，在每部史诗的结尾处，又都有作者添加的或多或少的乐观结尾；熙德手下的勇士在决斗中战胜了作恶的两公子，查理大帝领兵替罗兰复了仇，伊戈尔也最终逃回了祖国。另外，几部史诗中都有宗教意识的渗透、民间文学的影响，等等。这些共性表明，以《伊戈尔远征记》为代表的古代俄罗斯文学，已开始接近西欧的文学发展水平。《伊戈尔远征记》是在十八世纪九十年代由俄罗斯古文献专家穆辛-普希金在圣雅罗斯拉夫尔寺院中发现的，原稿不幸在1812年的莫斯科大火中被焚，幸有几个临摹抄本留存下来。《远征记》被发现后，在当时和后来都引起了学者和文学家的极大兴趣，人们解读、翻译它，撰文研究它。据不完全统计，《伊戈尔远征记》拥有的俄文译本就有近百种，许多著名诗人都曾译过它。研究《远征记》的著作和论文数以千计。数年之前，在乌克兰的基辅还举行过纪念《伊戈尔远征记》诞生八百周年的国际学术讨论会。作为俄罗斯古代文学的丰碑，《伊戈尔远征记》也引起了俄罗斯以外的学者和读者的关注，被译成几十种外文。在中国，1957年出版了由魏荒弩先生翻译的中文译本。

由于《伊戈尔远征记》这部史诗的过于完美，由于《伊戈尔远征记》出现时基辅罗斯文化水平的相对落后，有人曾怀疑《远征记》的写作年代，认为它系后人的伪笔。这座俄罗斯古代文学中的丰碑过于突兀，确实容易让人生出疑心。但绝大多数俄罗斯学者对这一意见持反对态度，从诗人普希金到当今的利哈乔夫院士，都为《伊戈尔远征记》作过有力的辩护。

第四节 蒙古鞑靼人统治时期的文学

十三至十五世纪，是俄罗斯民族历史上一个沉重、屈辱的时期，长达二百七十年的蒙古鞑靼人的统治，中断了俄罗斯民族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发展进程。蒙古鞑靼人攻占俄罗斯的土地，将一座座作为文明中心的城市夷为

平地。另一方面，由于草原游牧民族的流动性极强，不善经济和文化建设，所以也没有给俄罗斯文化添加进什么东西。长达近三个世纪的统治，这一来自东方的游牧民族给俄罗斯文化带来的影响，仅局限地表现为不多的外来词汇、装饰艺术中的某些主题和封建上层人士的服饰等。普希金曾说道：“鞑靼人不似摩尔人。他们征服了俄罗斯，却没有给俄罗斯带来代数学和亚里斯多德。”

在蒙古鞑靼人统治时期，古罗斯民族开始出现分化，后逐渐演变为俄罗斯（又称大俄罗斯）、乌克兰和白俄罗斯三个兄弟民族。真正独立的俄罗斯民族文学，是从这个时期开始的。

这一时期的文学，无论是民间的还是王公阶层的，无论是世俗的还是宗教的，都充满反对异族压迫、争取民族解放的爱国主义思想。

在民间创作中，英雄史事长诗在继承古老的史事诗传统的基础上形成了一个新的高潮。人们歌颂俄罗斯的勇士，歌唱罗斯往日的荣光，借以激起人们与入侵者斗争的信心和勇气。有一首史诗讲述绰号“红太阳”的基辅公弗拉基米尔公的伟绩，描写他如何在基辅的城门前击退了鞑靼入侵者。在这一时期的史事诗中，基辅和基辅大公是一个中心形象，它和他均被视为往昔的民族荣耀的象征，同时也是鼓舞人民的现实的力量源泉。这一时期，在一直未被征服的诺夫哥罗德等“自由”公国里，也流传着一些史事诗，如关于瓦西尔·希斯拉耶夫、关于萨特阔的歌谣等，这些史事诗描述的是和平生活，反映了诺夫哥罗德等地丰足的生活和维持独立的强大力量。

这一时期，在民间创作中出现了一个新的体裁，即史歌。与史事诗不同，史歌中的事件和人物都是真实的，所述事件也是在较近的时间里发生的。史歌实际上是关于现实的歌，只是对于后代来说它才是“历史的”。历史中的人物往往是普通人。这些人物及其功勋，有些被记录进了后世的书面文学，有些则在民间世代相传至十九世纪。

蒙古鞑靼人占领时期，编年史的写作大多中断了，只在莫斯科等地出现了规模较大、价值较高的编年史。这一时期书面文学中最醒目的一个体裁，是所谓的“战事故事”。战事故事以真实的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为基础，虽然有个别杜撰的细节；这种故事往往带有一些宗教色彩，但它仍是接近民间创作的世俗文学。这类故事中最著名的有这样几部：《拔都侵袭梁赞城的故事》、《米哈依尔·雅罗斯拉维奇大公在奥尔德遇害的故事》、《谢夫卡尔的故事》、《顿河彼岸之战》、《马迈大战记》。

《拔都侵袭梁赞城的故事》由两个故事组成，第一个故事叙述蒙古可汗、成吉思汗的孙子率军攻至梁赞城下，梁赞大公尤利派儿子费多尔去求和，拔都要求费多尔献上妻子，费多尔断然拒绝，被拔都杀害，费多尔之妻叶芙普拉克的西闻讯抱子跳楼自尽，尤利公率军前去迎敌，兵败，拔都焚毁梁赞城；另一故事叙述梁赞税收官叶夫帕季·科洛夫拉特率一队勇士与鞑靼军激战，最后英勇牺牲。故事带有宗教色彩，梁赞公一家的灾难被说成是神因他们的罪孽而给他们的惩罚，但是，故事也说明了封建王公的不和是鞑靼人连连获胜的原因，更写出了豪迈的誓言：“宁可英勇地死去，也不过受奴役的日子。”

《拔都侵袭梁赞城的故事》，被认为是《伊戈尔远征记》之后最珍贵的文学文献，是战事文学中最杰出的代表。

《米哈依尔·雅罗斯拉维奇大公在奥尔德遇害的故事》，说的是特维尔公被莫斯科大公暗害的事，从侧面抨击了封建王公间的自相残杀。《谢夫卡

尔的故事》叙述是 1327 年发生在特维尔的一场反抗蒙古鞑靼人统治的人民起义。

1380 年 9 月 8 日，莫斯科公德米特里·伊万诺维奇率领五万大军渡过顿河，在库利科沃原野上与马迈率领的蒙古鞑靼军激战，打垮了马迈军。这就是俄罗斯历史上著名的“库利科沃会战”。这次胜利，极大地鼓舞了被压迫的俄罗斯人，为俄罗斯民族最终摆脱蒙古鞑靼人的压迫奠定了基础。这次会战之后，出现了许多有关的故事和传说，其中最杰出的作品，就是《顿河彼岸之战》和《马迈大战记》。

《顿河彼岸之战》由梁赞的神父索封尼在库利科沃会战后不久写成，作者试图对事件的全过程作具体、详细的记述，借以歌颂俄罗斯人的胜利，歌颂德米特里·顿斯科依（“顿斯科依”在德米特里·伊万诺维奇会战后获得的绰号，意为“顿河之王”）的功勋。《顿河彼岸之战》与《伊戈尔远征记》有着十分明显的渊源关系，这部作品大量采用了《远征记》的叙述、修辞手法，甚至有大量的直接引文。但是，两部作品间的更深刻的联系，则表现在主题的一致上。《顿河彼岸之战》的作者同样声讨了某些王公的变节行为，同样回顾了基辅罗斯荣光的过去，同样发出了让全俄罗斯团结抗敌的呼吁。与《远征记》不同，《顿河彼岸之战》写的是俄罗斯军队的胜利，作者有意地在将这次胜利当作伊戈尔 1185 年那次失败的补偿。《马迈大战记》在关于库利科沃的作品中是内容最为丰富、流传最为广泛的一部。这部作品具有某种矛盾性：一方面，其作者对事件作了真实的记述，歌颂了俄罗斯军人的勇敢、俄罗斯王公的英明，宣扬了爱国主义精神和团结的思想；另一方面，作品却夸大了宗教力量在这场战争中的作用，在作品中，德米特里大公被写成一个虔诚的基督徒，他不断地祈祷，求助于神灵的保护。作品写了莫斯科主教奇普里安与德米特里大公的会晤，暗示主教在胜利中所起的作用，实际上，那位主教当时还没到莫斯科。宗教对世俗文学的影响，由此可见一斑。宗教意识和世俗思想的揉合、的冲突，正是古代俄罗斯文学的一大特征。

第五节 莫斯科国家时期的文学

史家将十五世纪末至十七世纪统一的俄罗斯国家称之为“莫斯科国家”。在驱逐蒙古鞑靼人的斗争中，莫斯科公国起了重大作用，逐渐地，莫斯科成了统一的俄罗斯国家的中心。国家的统一，为文化、文学事业的发展创造了条件，教育的兴办，印刷术的采用，书籍业的起始，所有这一切都刺激了文化事业。在这一时期所包含的两个世纪中，十六世纪的文学带有强烈的政论性，文学近似乎政论，所关注的焦点是民族统一方式、国家发展道路的问题；十七世纪，是俄罗斯中世纪结束的世纪，在十七世纪后半期，随着商业、贸易和手工业的发展，社会中出现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的萌芽，社会生活中出现了深刻的变革，文学中出现了某种转折，文学的民主化、世俗化、个性化色彩日愈浓重，讽刺文学、个人传记、作品中的杜撰情节、自由诗体等等的出现，就是这一倾向的体现。

十六世纪的文学作品和政治文献是很难区分的，一些思想深刻、文笔优美的政治著作，也历来被文学史家列为阅读和研究对象，如《弗拉基米尔诸王公传》和《伊凡雷帝和库尔布斯基通信集》。《王公传》无疑是一部体现王公政权官方思想意识的著作，这部传记中最主要的内容由两个传说组成：

一曰莫斯科的诸位王公均是古罗马皇帝奥古斯丁的后裔；一曰基辅大公弗拉基米尔登基时戴上的皇冠系拜占庭皇帝君士坦丁所授。这两个传说，旨在树立莫斯科大公们的威信，论证其权力的合理性和不可动摇性。这一传说与繁会方面关于“莫斯科系第三罗马”的说法是相互联系的。俄国东正教会认为，罗马帝国毁灭后，基督教的中心转移到了君士坦丁堡；拜占庭帝国灭亡后，欧洲宗教的中心又转到了莫斯科。只有莫斯科，只有俄罗斯，只有东正教会，才是欧洲古代宗教传统正宗的继承者。直到如今，在俄罗斯，某些教会人士和文化人仍持这一观点，并以此为骄傲。《伊凡雷帝和库尔布斯基通信集》是一个极有特色的小型书信选。库尔布斯基曾是伊凡雷帝手下的一位名将，后因不满沙皇的作为于1564年叛逃立陶宛，他从立陶宛给沙皇伊万四世写了四封信，认为沙皇对于贵族阶层过于残忍，规劝沙皇多施仁政，并给沙皇提出了一些治国策略；沙皇伊凡两度回信，信中不仅谴责了库尔布斯基的变节行为，同时也阐述了他的治国方针。当时，就有人将这几封信集在一起，终于使这份珍贵的文献留传至今。

讽刺文学的出现，是十七世纪俄罗斯文学民主化、世俗化的一个重要标志。讽刺文学，体现着新兴的市民阶层和手工业者的思想感情，在创作上与民间文学联系较深，其产生和发展，促进了口头创作和书面文学之间的不断接近。《硬鳍鲈鲈的故事》就是一部著名的讽刺小说，它将讽刺的矛头直接指向莫斯科国家的诉讼程序，表现了下层人士的感情和新兴手工业者的心态，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莫斯科生活的现实。

这一时期，文学创作开始由对具体、真实的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记叙，转向对虚构的人物和情节的描述，从纯粹的编年史式的记录，转向对个性的挥扬。或者，普通的市民走进文学，成为作品的主人公，他们充满浪漫色彩的奇闻逸事，成为作者和读者热衷的对象；或者，作品的创作者较留心于自己和自己内心的感情和状态了，从作品的语言到作品的思想，都带有了更多的随意性和主观性。十七世纪的俄罗斯文学出现了新的转折，它开始挣脱中世纪思想意识的束缚，走上一条更为自由、健康的发展道路。在这一点上，阿瓦库姆（1620/21—1682）及其《圣徒传》是很具有代表性和象征性的。作为俄国分裂教派的首领和思想家，大司祭阿瓦库姆是激进的尼孔改革的激烈反对者，他主张因循守旧，是宗教上和政治上保守势力的代言人。1666年，他被高级神职人员会议判决流放到普斯托泽尔斯克，在那儿的土牢中被囚禁了十五年，在土牢中，他写成了著名的《圣徒传》。《圣徒传》的作者，却无疑是一个文学上的革新家！他大量引进民间和生活语言，大胆吐露内心情感，并对自己的身世和周围的现实作了生动而又真实的描绘。所有这些，使得《圣徒传》成了一部充满民主色彩的个性色彩的杰作。这部作品，也是俄国文学史上“忏悔自传”体裁的奠基之作。

十七世纪文学中又一重要的事件，是俄语诗歌中音节诗体的确立。音节诗体的创始人是西梅翁·波洛茨基（1629—1680）。西梅翁·波洛茨基原是白俄罗斯人，后在莫斯科进行卓有影响的宗教、政治教育活动，他担任过沙皇子女的家庭教师，创办了斯拉夫希腊拉丁学院。他曾与俄国分裂教派激烈论战，是宗教界和社会上激进势力的代表人物之一。西梅翁·波洛茨基的音节诗体，要求诗的各行拥有相同的音节数，重音音节在每一行的中部，押阴韵。波洛茨基还亲自实践了他的音切诗体，他的诗集为两个诗集，即《韵律集》和《多彩的花园》。诗集中的诗大多是献给沙皇的家庭成员的，描写

的是沙皇家庭和宫廷的人和事，也有对户外生活和人的内心的描摹。1680年，西梅翁·波洛茨基编成了《韵体圣诗选》。这个圣诗本极受欢迎，流传很广，在很长的时间里被许多人用作学习课本。波洛茨基的诗歌理论和实践，不仅丰富了十七世纪的俄罗斯文学，也为俄语诗歌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第二章 十八世纪文学

第一节 概说

十八世纪，俄罗斯已脱离了中世纪的愚昧和落后，作为一个统一而强大的封建君主专制国家进入欧洲大国的行列。在这个世纪，俄国的社会和经济逐步走向稳定与发展的道路，俄罗斯文学也从幼稚走向成熟，为十九世纪文学的灿烂景观提供了必要准备。

俄罗斯在十八世纪的发展与俄国进入该世纪后的第一位沙皇彼得一世（1687—1721 在位）的贡献分不开的。他的改革不仅对当时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也对俄国后来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彼得一世登基后至十八世纪初，他先后进行了对土耳其和瑞典的战争，特别是持续二十余年、与瑞典所进行的北方之战，使俄罗斯夺得了涅瓦河口、波罗的海出海口，打开了俄国通向欧洲的窗口，对俄国与欧洲各国的交流提供了必要的条件。除了对外征战、扩大沙俄帝国的版图，彼得一世对内也进行了一系列重大改革，他曾身体力行，去欧洲学习先进的造船技术，回国后，他在政治上加强中央集权制，大力发展工商业，建立了一个强大的君主制国家。他开办各种学校，选送贵族子弟去西欧留学，使教育突破了教会的垄断，他还创办了俄国第一份报纸《新闻报》，在社会上推广欧洲时尚，法语、法国的时装和礼仪成了当时上层社会的“包装”。彼得一世的改革及其对欧洲文化的引入，形成了西欧文化与俄罗斯民族文化历史上的第一次碰撞，它将欧洲先进的技术和一些进步的思想传入俄国，促使俄罗斯这个刚刚统一、停止征战的民族一改闭塞的生活方式，在整个人类历史进程中跟上了时代的步伐，西欧与斯拉夫两种文化倾向长期不息、彼此消长的论争也在这时开始，在这种交流与论争中，俄国的文化、乃至整个民族的文明水准亦得到了发展和提高。因此，彼得一世的改革不仅造就了一支强大的海军，造就了一个物质上富强的国家，也造就了一个在文化层次上不断成熟的民族。

十八世纪的最初三十年，俄国的文坛同动荡的社会相比，显得相对平稳。除延续一些旧的文学体裁外，新的文学体裁尚未成熟。大主教费奥方·普罗科波维奇（1681—1736）的布道讲话《彼得大帝葬礼上的讲话》（1725）被认为是文化领域的重大事件，这个讲话实际上是一篇宗教色彩浓厚的政论文，这种文体在该时期受到如此重视，是与彼得一世宣传改革、呼吁变革的现实相适应的。除了费奥方·普罗科波维奇，当时还出现了波索什科夫（1652—1726）、塔齐舍夫（1686—1750）等有成就的政论家。在这个时期模仿西方文学作品的小说、诗歌也较多，但出色而具有鲜明个性的作品较少，大多是粗糙之作。

俄罗斯文学至十八世纪三十年代古典主义和后来的感伤主义文学兴起之后才有改观。

古典主义文学浪潮产生于十七世纪的法国，是君主专制制度的产物，这种文艺思潮拥护王权和崇高的理性，艺术上追求和谐、完美，提倡“三一律”（那同一时间、同一地点和同一情节）。古典主义由欧洲传入俄国时，法国已由古典主义极盛时期转入启蒙主义时期，所以，俄国的古典主义作品除具有歌颂开明君主、歌颂个人对国家利益的服从、艺术上严格遵守各种清规戒律（体裁、文体等）外，还带有鲜明的启蒙主义思想倾向，即平等意识。巩

固中央集权制，歌颂君主专制制度是当时俄国现实的需要，也是古典主义思潮得以传播的条件。它关于君主、国家的思想有利于俄国的统一，它对文学形式和语言方面的要求，无疑促进了俄国文学在技巧上走向成熟与规范。在这个时期，俄国出现了康捷米尔、特列佳科夫斯基、苏马罗科夫、赫拉斯科夫、罗蒙诺索夫等杰出作家，其中，康捷米尔和罗蒙诺索夫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人物。

康捷米尔（1708—1744）是俄国第一个讽刺作家。他的作品主要讽刺、抨击保守势力，批判他们在彼得一世改革后复辟和倒退的倾向。他的诗篇《告理智，或致诽谤学术者》、《费拉列特和叶甫盖尼，或论堕落贵族的妒嫉与傲慢》在当时以手抄本形式广为流传。罗蒙诺索夫（1711—1765）是该时期又一位杰出的诗人，也是俄国历史上第一个伟大的学者、思想家。他不仅在语言、文学上有伟大建树，而且在物理、化学、天文等方面也都作出了巨大贡献。他创办了如今享誉世界的莫斯科大学，他的《修辞学》（1748），《俄语语法》（1755）、《论俄文格律书》（1735）等主要著作，不仅奠定了语言学、修辞学基础，而且以语言、语体的改革对俄国文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的《与阿那克里翁的对话》、《攻克霍丁颂》、《伊丽莎白女皇登基日颂》、《彼得大帝》等诗篇被誉为俄国文学史上古典主义的佳作。

感伤主义在俄国产生于十八世纪末，在古典主义与感伤主义之间，还有一个讽刺杂志流行、社会思想活跃的时期。这个时期的文学社会生活，与俄国历史上另一个有名的沙皇——女皇叶卡捷琳娜二世的活动密切相关。叶卡捷琳娜二世在位（1762—1769）之初，为了标榜自己的开明，在一边将土地、农奴封赐给她的宠臣时，她还高唱自由主义的颂歌，以欺骗人民。她以匿名创办的刊物《万象》（1769—1770）虽不可能涉及农奴制这一根本性的问题，但却引发了社会各界参与社会变革的思想，各种与之类似的讽刺刊物，如诺维科夫的《雄蜂》（1769—1770）、楚尔科夫（1744—1792）的《杂拌儿》（1769）等相继出现，这些杂志的风格一改古典主义歌功颂德的倾向，讽刺中带有批评、抨击，幽默中有深刻的劝戒，因此，对社会的发展具有推动和监督作用。特别是诺维科夫和他创办的《雄蜂》，在当时堪称佼佼者。该杂志揭露了“他们劳动，你们却享受他们的果实”这种社会现实，对农民的悲惨处境寄予了深刻的同情，其尖锐性使自诩“开明”的当局不得不令其停刊。但它所传播的启蒙主义思想和对现实的否定意识却对当时社会的进步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1773年，地主对农民的剥削最终酿成了一场震撼欧洲的农民起义——普加乔夫起义。这场起义反映了农奴制这一成熟的国家机器对人民的压迫，使人民、也包括一些有进步思想的贵族开始清醒面对现实，文学不再拘于对君主帝王的歌功颂德，和对所谓开明政治的幻想，因此，除了出现以卡拉姆津为代表的感伤主义文学潮流外，还出现了一批逐渐摆脱古典主义、乃至感伤主义影响，将目光和笔触投向社会的代表作家。他们的出现，改变了俄罗斯当时文坛的景象，在他们的作品中，已流露出俄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端倪。俄国文学史上文学对社会的责任感、作家对文学事业的责任感这一传统也可追溯于此。

感伤主义在俄国兴起于十八世纪八十年代，它源于十八世纪的英国，与古典主义迥异，它崇尚情感，重人物的内心感受，其主人公也非帝王和功臣，而是普通人，这是一种深受启蒙主义思想影响的潮流，它表现了人们对平等

的理想，它在艺术技巧上重人物心理刻画，也为文学形象的个性化提供了必要的前提。在西方，以歌德的《少年维特之烦恼》为代表。尼·卡拉姆津(1766—1826)是俄国感伤主义文学流派的代表人物。他的《一个俄国旅行家的书信》(1792)和中篇小说《可怜的丽莎》(1792)被人们视为俄国感伤主义文学的代表作。在卡拉姆津的同时代，还有一批摆脱古典主义影响，在俄国社会中成长起来的优秀作家。他们的创作可以说在实践上离批判现实主义文学又进了一步。这些作家中的代表人物是杰尔查文(1743—1916)、冯维辛(1744—1792)和拉季舍夫(1749—1802)。杰尔查文从叶卡捷琳娜二世统治的歌颂者到农奴制社会的揭露者，他的代表作《费瓦察颂》(1782)、《致君王与法官》(1787—1794)在不同程度上表现了作者对叶卡捷琳娜统治的讽刺和批判，特别是后者，作者借上帝之口教导人间的帝王君主，宣传除恶扬善的正义思想，深受后世贵族革命家的推崇。冯维辛的剧作《纨绔子弟》(1782)以十八世纪下叶俄国外省地主庄园的日常生活为背景，展现了贵族阶级中保守与先进两个阵营的激烈冲突，暴露了农奴制造成的恶果，在揭露农奴制的弊端方面，可谓俄国文学史上的先驱作品之一。拉季舍夫被史家称为俄国历史上第一个贵族革命家。他虽出身贵族，歌颂过彼得一世的改革，但这位深受启蒙思想影响的贵族却因他那部宣扬以暴力推翻农奴制的作品《从彼得堡到莫斯科旅行记》(1790)而被叶卡捷琳娜二世视为“比普加乔夫更坏的暴徒”，以至被逮捕，流放，最终以自杀捍卫自己的尊严和理想。

《从彼得堡到莫斯科旅行记》是一部旅途见闻录，它采用了感伤主义文学中最常见的体裁，介绍了俄国最普通、也就最众多的农民的生活，贴近现实，因而也就越具有反农奴制的倾向，在艺术技巧上，作者采用了朴实的现实主义描写。这对后来的批判现实主义文学思潮具有一定的影响。

彼得一世的改革和叶卡捷琳娜二世的执政，使十八世纪的俄国从一个完全封闭和分裂的封建社会变成了一个物质上比较富强、精神上逐步开放的完善的农奴专制国家，随着国家的强大和国家机器的完备，各种矛盾也逐渐暴露出来，在文化以及文学这个层面上，又相应产生了从对封建帝王歌功颂德到为普通人、乃至社会底层人呐喊这一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俄国文学史上出现了康捷米尔、罗蒙诺索夫、卡拉姆津、冯维辛和拉季舍夫等一系列杰出人物，无论是在诗歌、散文，还是在戏剧方面都出现了一批优秀之作，从这些作品中，不仅仅能看到西欧先进的启蒙思想、人文主义思想的闪光，而且还反映出俄国作家与众不同的公民意识和反抗意识，这乃是十九世纪俄罗斯文学在世界文坛上独领风骚所必不可少的条件。从这一点看，十八世纪的俄罗斯文学的确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

第二节 罗蒙诺索夫

言及俄罗斯文学形成之初和俄国文学语言的确立，不能不提及十八世纪一位伟大的学者和教育家——罗蒙诺索夫。

米哈伊尔·瓦西里耶维奇·罗蒙诺索夫(1711—1765)出身于濒临白海的阿尔罕格尔斯克省一个农民家庭。他自幼聪明过人，但由于出身农民家庭而被学校拒之门外。1730年，他来到莫斯科，隐瞒了自己的出身，考入了斯拉夫希腊拉丁学院。1736年，他以优异成绩被派往彼得堡科学院，稍后又选派德国深造，学习自然科学技术，还曾求学于法国哲学家莱布尼茨的弟子

沃尔夫，1741年学成回国，从此便终身任职于科学院。

罗蒙诺索夫是那个时代最博学的人，他曾经对自然科学领域中多种学科进行过研究，在物理、化学、天文、冶金、哲学方面都有很大的贡献。他用唯物主义观点研究自然，1760年，他发表了著名的论文《论物体的固态和液态》，在这篇文章中，他提出了物质和运动的不灭定律，他在自然科学诸学科研究中所取得的成就，为俄国自然科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罗蒙诺索夫是俄国文化教育事业的奠基人之一。他留学回国后，一直热心教育事业，在他的倡议下，莫斯科大学于1755年成立，他一生的活动，都与教育的启蒙宣传紧密相关。

在俄罗斯语言文学的发展上，罗蒙诺索夫也做出巨大的贡献，作为诗人，他是俄国十八世纪古典主义文学的奠基人之一，作为一个学者，他又是俄国诗歌语言改革的积极倡导者。他用自己的实践和理论，实现了俄国文学史上一次大的进步。他的诗歌名篇中，有歌颂君主宣扬爱国主义的《与阿那克里翁的对话》，歌颂俄国对土耳其战争胜利的《攻克霍丁颂》（1739）、赞扬彼得改革的名作《彼得大帝》（未完成），以及《伊丽莎白女皇登基日颂》，除此，《夜思上天之伟大》（1748）和《晨思上天之伟大》（1751）也是他的代表诗作，后两首诗虽形式同于圣经中的赞美诗，但其中所表现出的唯物主义思想却代表了他所持的进步立场和先进的世界观。《与阿那克里翁的对话》是他的纲领性作品，这首诗充分表现了他的古典主义文学观念和他的激昂的爱国主义热情，宣扬了国家利益高于一切的思想，他对希腊诗人阿那克里翁说：

爱情的思想，
不要再扰乱我的心智，
虽然我并未失去。
爱情中那股柔情；
但更能使我欢欣的
是英雄们的不朽的光荣。

在他的另一首颂诗中，他曾充满信心地呼吁着祖国未来的年轻人：

啊，在你们的时代多么幸福！
如今应该振起精神，
用你们的勤奋证明，
俄罗斯的大地能够，
诞生自己的柏拉图
和才思锐敏的牛顿……

这一系列充满爱国主义激情、歌颂君主英明、歌颂英雄业绩、歌颂理想追求的诗行，无一例外地表现了他的文学主张，因此罗蒙诺索夫又被后人称为俄国古典主义诗歌的“典范和立法者”，在使理想与现实距离缩短这一方面，他的诗歌确实在俄国诗歌、乃至文学史上开一代风格之先。他被人们评价为“用诗的语言来表达发自内心深处的热情、感觉和追求”。

对祖国语言的研究成就是罗蒙诺索夫对俄国文化的又一大贡献。十八世

纪上半叶，由于彼得一世改革所带来的崇尚西欧、尤其是法国之风，使俄国当时的语言十分混乱。针对这种崇外的社会风气，罗蒙诺索夫写下了《修辞学》（1748）、《俄语语法》（1755）、《论俄文宗教书籍的裨益》（1758）、《论俄文法律书》（1739）等学术著作，在这一系列著作中，他赞扬了俄罗斯语言那种“天然的丰富、美和力量”，对当时外来语的大量涌入、古斯拉夫语和俄罗斯语并用的情况，罗蒙诺索夫科学地把词汇分为三类：一、斯拉夫语。即书面语言，这种语言在口语中基本不用，只限于有文化人用于阅读。二、斯拉夫语和俄罗斯语言共同使用的词汇。三、日常生活中常用的俄罗斯口语。他主张不同的文体应运用不同的词汇，如：高级体，即史诗、颂诗、悲剧，就应运用第一，二类词汇；中级体，即戏剧、诗体书信、讽刺诗、牧歌、哀歌等，就应运用第二或三类词汇；而低级体，即喜剧、小说，就应用第三类词汇。罗蒙诺索夫这种词汇划分和对文体的严格分类，克服了当时语言混杂的现象，为文学语言的规范化奠定了一定的基础，作出了重大贡献。

在深入研究俄罗斯民族语言的基础上，罗蒙诺索夫对俄语旧体诗进行了改革，提出了将音节体诗改为音节和重音并重体诗的主张，这是罗蒙诺索夫对俄国文学发展的又一大贡献。在罗蒙诺索夫提出诗体改革前（即十八世纪初），俄国采用的是音节诗体，也就是每行诗的音节数目相同，而重音数不限。1735年，虽然有特列佳科夫斯基（1703—1768）的《俄语诗简明新作法》一书提出重音诗体的长处，但他只提倡用两个音节构成的音步，第一音节为扬抑格重音，否定抑扬格（两个音节构成的音步，第二音节为重音），而每个诗行韵必须是阳韵（即倒数第二个音节押韵）。在特列佳科夫斯基的书中，作者对非十一或十三个音节的诗行没有要求，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仍可运用音节诗体，因此，特列佳科夫斯基的诗体改革被认为是不彻底的。罗蒙诺索夫的诗体改革则将特列佳科夫斯基的诗体改革又推进了一步，他认为：一行诗可不拘于音节数目多少，但轻重音节的排列必须规律，可以用抑扬格或扬抑格（二音节的音步），也可运用扬抑抑格或抑扬扬格（三音节的音步），还可以押阳韵（即最后一个音节押韵）等等。这种改革对当时的诗歌创作乃是一次大的解放，它是注重形式美，即诗歌的音乐感，在与内容的统一中，体现出了语言相应的完美。

第三节 感伤主义文学与卡拉姆辛

感伤主义文学源于十八世纪中后期的英国，是英国产业革命加紧进行时人们那种低落、悲观、压抑、失望情绪的反映。英国诗人E·扬格的长诗《哀怨，或关于生命、死亡和永生的夜思》（简称《夜思》）和英国诗人T·格雷的《墓园哀歌》、德国作家歌德的《少年维特之烦恼》、法国作家卢梭的《新爱洛绮思》均是轰动欧洲的感伤主义代表作品，在这些作品中，作者带着浓厚的感伤情绪或沉溺于宇宙幻灭的痛苦之中，或表现出了对默默无闻的普通人的同情，批评了社会上层人物的傲慢和奢侈，表现出了启蒙主义生而平等的思想。

与古典主义迥异，这一流派的作家反对对理性的崇拜，他们不去歌颂贤明的君主和建立伟业的英雄，而着重表现普通人，如产业工人、农民、或知识分子的喜怒哀乐，抒发自己对他们的感情，引起读者对他们的同情。这是社会进一步民主化的反映，也是启蒙思想影响的结果。在艺术特征上，感伤

主义文学作品比较注重人物的心理刻画，作者的笔触往往随主人公的情感活动而起伏，叙述常常带有浓厚的感情色彩，人物的性格较之于古典主义文学作品中的角色，更加有个性、更加丰满。他们所运用的文体，是最便于抒发作者主观感受的书信体、旅行记或哀歌等。一般认为，在欧洲文学史上，感伤主义文学是浪漫主义文学浪潮必不可少的准备。

十八世纪末，感伤主义传入俄国并找到其在俄国的代表人物——卡拉姆辛。可以说，俄国感伤主义文学与卡拉姆辛的创作活动是密不可分的。别林斯基曾评论他“开辟了俄罗斯文学中一个新的时代……把俄罗斯文学引入了新思想境界”。

尼古拉·米哈伊诺维奇·卡拉姆辛（1766—1826）出生于萨马尔省的一个地主家庭，少年时代，曾就读于莫斯科的寄宿中学，并在莫斯科大学旁听，1758—1789年间，他曾加入了莫斯科的共济会，编辑刊物《儿童智育读物》（1785—1789），1789—1790，卡拉姆辛游历了德国、瑞士、法、英国等西欧国家。1791年至1792年间，他主持了文学月刊《莫斯科杂志》的编辑出版工作，开始发表他的名作《一个俄国旅行家的书简》和小说《可怜的丽莎》、《贵族女儿娜塔丽娅》等。

《莫斯科杂志》是卡拉姆辛宣传感伤主义的阵地，在十八世纪九十年代，该杂志确立了感伤主义这个俄罗斯文学的新倾向，对当时占统治地位的古典主义进行了挑战。就卡拉姆辛的创作活动而言，不论是取材、选择的描写对象和塑造人物的方式，都是感伤主义文学主张的实践。与文学活动相呼应，1801—1802年间，卡拉姆辛还主办了政治性文学刊物《欧罗巴导报》，在这一杂志上，他发表过自己的文学作品和政论文章，阐述了自己的美学纲领，即文学应当有助于培养国民的道德精神和爱国主义精神。

在卡拉姆辛的文学作品中，《一个俄国旅行家的书信》和《可怜的丽莎》是其代表作品。前者是一部在文体和内容上都十分典型的感伤主义文学作品，记叙了作者游历欧洲多国的经过、见闻、感受。很显然，在这部作品中，对亲身体验的描绘和主观的议论、抒情是占重要位置的，所以，作者曾说：“这是十八个月来我心灵的一面镜子！”《可怜的丽莎》描写了一对青年男女相爱、而又由于社会地位的悬殊最终分手的故事。埃斯特拉是个贵族青年，他爱上了温柔而美丽的农家姑娘丽莎，丽莎对他也十分倾心。埃斯特拉无法摆脱自身的贵族习气，因贪赌而破产。为了拥有一笔丰厚的财产，他背弃了丽莎而与一个富有的寡妇结婚。丽莎得知埃斯特拉的背叛后，悲痛万分，投湖自尽。在社会文明的玷污下，埃斯特拉失去了纯洁而质朴的品质，变成了一个残酷无情的恶棍，作者的同情始终在丽莎、她的父母这些善良、纯洁的普通人身上，他一边向读者讲述着这个悲惨的爱情故事，一边抒发自己的感情，以丽莎的痛苦和自己的关切同情之情来打动读者。在作者笔下，社会底层那些未经文明玷污的人和上层社会的人（即贵族）是对立的，丽莎虽然出身低微，但她的心却比贵族出身的埃斯特拉更纯净、更美好。作者谴责了上流社会青年的轻浮，但将男女主人公爱情悲剧的根源归结为埃斯特拉的浅薄、却并没有挖掘出这一悲剧的社会根源。这种描写虽从某种程度上掩盖了当时的社会矛盾，将其归结为男女主人公个人的悲剧，但小说却以其优美清新的文字，透过抒情的写景而表现出的真诚，在古典主义长期占统治地位的文坛上令人耳目一新，比起古典主义文学作品中那些缺乏人情味而没有生气的帝王君主、英雄人物来说，小说更能引起普通读者内心的共鸣。因此，小